

第三章 北宋前期貶謫詩之出處主題分析

《詩·大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點明詩歌是詩作者情感的產物，而觸動其情感興發之媒介則是詩人所感知的外在世界種種變化，正如《文心雕龍·明詩》及《詩品》所述：「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¹「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除外在之物外，人事變化與經歷亦為觸發詩人情感、創作的主要因素，是故「楚臣去境」、「漢妾辭宮」、「塞客衣單」等不同的生命情境皆影響著詩人的創作內容及對自身生命的感悟，而貶謫詩是士人因罪遭謫時期的作品，其詩作中所呈現的情緒波動、志向表露或哲理體悟，亦必然或隱或顯地與作者的貶謫經歷相互連結，呈現出仕途之挫折對他們的思維情感與價值內容的影響。創作是一個情感宣洩的出口，透過文字貶謫詩人得以抒發心中鬱而不通的情緒，黑格爾曾經指出，詩是「愉悅或痛苦的心情的自由流露，有了這種心情，就要把它歌唱出來，心裡才舒服」²，歐陽脩在探求《詩》之本義時亦嘗言：

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於口，道其哀樂喜怒於心，此詩人之意也。³

而在貶謫詩中的情感宣洩又往往與志向表述交揉在一起，這是由於因貶謫而生的哀樂情感總是與詩人理想價值之無法伸展密切相連的，像是屈原被放逐澤畔時，所作的《離騷》、《天問》、《九章》諸詩，便同時表現諷諭政治的「言志」傾向，又內蘊舒洩憤懣的「緣情」自覺⁴。因此，為能從紛然並呈的貶謫詩作中尋繹、統整其思想內容，筆者擬藉「主題」此一概念對北宋前期的貶謫詩作深度的爬梳及抉發。「主題」指在文學作品裡反覆出現的一種題材類型，像是：別離主題、惜時主題、遊仙主題等……，杜松柏以為主題即為詩所立之「意」，乃一詩之

¹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臺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年5月），頁44。

² 朱光潛譯，黑格爾著，《美學》第三卷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212。

³ 歐陽脩，《詩本義》（臺北：藝文，1965年），卷十四，《時世論》。

⁴ 潘嘯龍、蔣立甫，《詩騷詩學與藝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5月）。頁6-7

範圍，如畫地爲牢，不可逾越⁵，說明主題所指即爲統攝詩作內容的中心思想，西方學者烏爾利希·韋斯坦因則認爲主題的選擇對個體有獨特的心理意義：

主題是個人對世界獨特的態度。一個詩人心目中主題的範圍就是一份目錄表，這份目錄表說明了他對自己生活的特定環境的典型反應。主題屬於主觀的範圍，是一個心理學的常量，是詩人天生就有的。⁶

他以爲作品主題往往隱含主觀的心理內容，反映個別作者所關注的議題，以及典型化的反應及思考模式。近代原型批評理論則進一步用「原型」⁷概念來詮釋主題書寫與集體作者心理二者的關係，認爲在文學史中反覆出現的主題，並非只是因襲前代創作的程式化書寫而已，在其規律性的書寫模式裡，實呈現一種共同性、相通性的文化內容，反映出某特定單位的族群關注的議題與對應此議題的心理反應。

「士」作爲一個特殊社群，扮演傳統知識分子的角色，雖非一個有形的組織、團體，卻因著悠久歷史文化的發展、積澱，產生一套內部的價值理念及身分認同標準。士既以出仕爲志，當士大夫遭受貶謫之挫折時，如何重新思考並定位自己的角色、即成爲他們最重要的生命課題，因此研究貶謫文學時，「出處主題」無疑是必須著重的核心所在。有鑒於此，本章擬以「出處主題」爲焦點分析北宋前期的貶謫詩作，藉以探究其時士大夫在貶謫時期調適、安頓一己生命價值之心路歷程。

由於貶謫士人的出處態度與個人之生命經歷有著密切的聯屬性，因此本章將先採分論形式依時代之先後，略述北宋前期幾位具代表性的貶謫詩人的貶謫經歷，並試析其貶謫詩作所呈現的思想內容，所介紹的詩人則爲生平資料清楚，並有較爲豐富完整的貶謫詩作者。然後

⁵ 杜松柏，《詩與詩學》（臺北縣：洙泗，1990年），頁241。

⁶ 劉象愚譯，烏爾利希·韋斯坦因，《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遼寧：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21-125。

⁷ 在榮格的學說裡，原型是集體無意識的內容，集體無意識處於人類心靈的最深層結構，由人類數千年心理經驗的碎片所組成，這些經驗透過遺傳代代保留下來，成爲一種「種族記憶」潛藏在人內心深處，是人對外界的認識、刺激的反應的一種先驗普遍的心理模式。參見：榮格，《心理學與文學》（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

將略述北宋以前出處主題發展之情形，再進一步從綜觀的角度來歸納、分析北宋前期的貶謫詩作的出處主題流露什麼樣的一致性與時代特色。

第一節 個別詩人貶謫經歷與出處心態

一、田錫（940-1003）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其人「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性格耿介剛直、「好言時務」。田錫為人嚮慕古道，嘗言：

士大夫所貴者，樹德如親仁，博學以師古。師得古道，以為己任；親乎仁人，以結至交。 倡道和德，同心為謀，上翼聖君，下振逸民，使天下穆穆然，復歸於古道。⁸

從「親仁」、使天下「歸於古道」等敘述，可知其思想傾向儒家性格、有著承擔文化秩序的責任意識，田錫在知睦州任內便嘗建孔廟興學、致力提昇當地學術、文化風氣。田錫為官直諫敢言，太宗端拱二年京畿大旱，時任知制誥的田錫，因上章言及「調燮倒置」，兩以此勸喻君主及宰臣須納諫規過，結果「帝及宰臣皆不悅」，田錫因此被罷為戶部郎中，出知陳州，後徙單州⁹。

考察筆者選錄的田錫八首貶謫詩作內容，即為田錫在知陳州、單州時所作，這八首詩作皆為長篇抒情之作，從詩作內容可發現田錫在貶謫期間仍究不忘己志、憂勤國事，他曾在陳州寫下「而今出典淮陽郡，組綬輝華佩金印。才微任重副憂勤，履薄臨深守廉慎」(〈進瑞雪歌〉，)之語，顯示其在貶謫時期仍抱持恭敬謹慎的為官態度。田錫在另一首詩作〈思歸引〉更表現出為國為民、忠而忘身的情懷，其詩云：

⁸ 田錫，〈貽青城小著書〉，收入曾棗莊、劉琳 主編《全宋文》(四川：巴蜀書社，1988年)，冊三，卷八九。

⁹ 「自秋徂冬不雨，知制誥田錫上言：『此實陰陽不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疏入，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見：清 畢沅，《續資治通鑑》(臺北：文光出版社，1975年)，冊一，卷十五，宋紀十五，太宗端拱二年十二月，頁157。

河朔受詔書，移官向沽外。初問禁法茶，次問丁身稅。稅口徵四百，茶利高十倍。老死及充軍，縣籍方消退。采摘不入官，公家定科罪。何以升平時，遺民猶未泰。何以在位者，興利不除害。我願罷秩歸，天顏請轉對。一言如沃心，恩波必霑霑。（〈思歸引〉）

詩中詳細描寫人民為稅役所苦之景況，並自言：「我願罷秩歸，天顏請轉對」，田錫願意罷秩歸去，以期使君主重視此一現象，呈現他不計個人名位榮顯的磊落胸襟。

雖然田錫在其他詩中亦偶流露「我年漸似下坡輪」（〈代書呈蘇易簡學士希寵和見寄以便題之于郡齋也〉）、「孤懷無緒懷已知」、「金日玉堂若無分，隨分官職胡不歸」（〈歸去來〉，）等哀歎衰老而思隱退的情緒。但從田錫後來被召為工部員外郎，仍舊勇於「復論時政闕失」的情形，可知貶謫經歷並未改變他直言耿介、積極於政事的為官態度。

二、王禹偁（954-1001）

（一）生平事蹟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太宗太平興國八年進士。他少時即才學拔萃，據邵博《邵氏聞見後錄》所載：王禹偁曾以「蜘蛛雖巧不如蠶」一句，巧對濟州太守所出的上句：「鸚鵡能言爭似鳳」，而深獲畢士安賞識，讚譽他有「經綸之才」。王禹偁在謫居歲月曾作詩自云：「步驟依班馬，根源法孔姬」、「致君望堯舜，學業根孔姬」，顯示其思想性格深受儒家薰染，他亦嘗言：

古君子之為學也，不在乎祿位，而在乎道義，用之則從政而惠民，舍之則修身而垂教，死而後已，弗知其他。

其中「死而後已，弗知其他」的態度，正與儒家所說的「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的精神遙相呼應，因此他無論在詩文或為官態度上均展現強烈「以道自任」的意識。王禹偁懷抱著「男兒得志升青雲，須教利澤施于民」的參政理想入仕，在首次被召赴京就職，任右拾遺、直

史館時，旋即展現他直言敢諫、積極用世的參政姿態，立時向太宗上〈端拱箴〉以示規諫¹⁰，其後亦多次在朝政、軍務上屢進建言。出身寒素的他對民瘼有著同理的體認及關懷，據《宋史》記載：有一年京城大旱，王禹偁上疏云：「今旱雲未沾，宿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饑可憂。」他建議太宗下詔百官減俸以拯民艱，並自言：「臣朝行中家最貧，俸最薄，亦願首減俸，以贖耗蠹之咎。」¹¹即使家貧俸薄，他仍願為饑民貢獻微薄之力，足可見他對民生疾苦的真誠關注。然而王禹偁剛直耿介的態度亦為太宗及臣僚所忌，太宗便曾謂宰相曰：「禹偁文章，獨步當世；然賦性剛直，不能容物，卿等宜召而戒之！」¹²王禹偁始終以道自守、剛直不屈的個性亦成為他仕宦生涯屢遭貶謫的主要原因。

王禹偁的貶謫經歷第一次在淳化二年，當時王禹偁任大理評事，廬州尼姑道安誣告徐鉉，王禹偁為之辨誣抗疏，結果被貶為商州團練副使。第二次則在太宗至道元年，禹偁因論孝章皇后之喪禮當用舊制，以訕謗朝廷的罪名被貶知滁州，次年改知揚州。第三次則是在真宗咸平二年，禹偁因修《太宗實錄》時直言太祖篡周，引起宰執不滿，又被貶知黃州，咸平四年冬，改知蘄州，不久即去世。他的三次被貶，都是因為堅持自己的價值理念所致，「直而見斥」與長期貶謫的經歷¹³，使他寫下許多描寫貶謫心境及生涯的詩作，在其別集《小畜集》裡收錄的五百八十餘首詩作，三段貶謫時期所作者便占其中一百三十首（不含量移解州及改知揚州時之作品）。

2 詩歌內容

王禹偁是北宋時期第一位表現強烈謫官意識的詩人，在其貶謫時期的詩作中，他幾乎都以「謫官」、「謫宦」¹⁴自稱，檢視北宋前期其

¹⁰ 「丙寅，以大理評事鉅野王禹偁為右拾遺，華陽羅處約為著作佐郎，並直史館，賜緋；舊止賜塗金帶，特命以文犀帶寵之。禹偁即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同註 11，卷十四，宋紀十四，太宗端拱元年正月丙寅條，頁 331。

¹¹ 元 脫脫，《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冊十六，卷四三九，列傳第一百九十八，《文苑一》。

¹² 宋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冊一，卷一，卷十六，宋紀十六，太宗淳化四年八月，頁 391。

¹³ 王禹偁作〈三黜賦〉，中有「一生幾日，八年三黜」之歎。《全宋文》（四川省：巴蜀書社，1988年），卷一三七，頁 209。

¹⁴ 王禹偁貶謫時期詩作中「謫官」、「謫宦」、「逐臣」等詞出現之詩題如下：

他詩人之作，以「謫宦」、「謫官」自稱者，較以「遠宦」、「游宦」自稱者為少，《說文》「謫」下云：「謫，罰也，從言畜聲。」「謫」字伴隨著責罰的意涵，相較於「遠宦」、「游宦」而言，便帶著更為強烈的自我貶抑意味，閱讀王禹偁的詩文，可以發現他對自己的「戴罪」身分是深感慚怍且時刻難以釋懷的，他在〈酬种放徵君〉這首長詩裡洋洋灑灑地寫下自己初貶商州的經歷及獲罪原因：

人傳到遷客，面目敦慚怍。待罪始知非，咄哉昧先覺。一
 聆高世行，罪髮庸可濯。忍恥賦三章，塵埃寄寥廓。君恩
 已絕望，人事終難度。相府一張紙，喚起久屈蠖。（〈酬种放徵
 君〉）

「待罪始知非，咄哉昧先覺」二句顯示他對自己由於伸張公義而見黜，實是始料未及的，雖然無愧於自己的價值理念，但戴罪身分仍使王禹偁深覺恥辱，「人傳到遷客，面目敦慚怍」，顯示對貶謫詩人而言，他人審度的眼光或許是一種無形且更加難堪的精神責罰。

到第三次被貶黃州時，連續三次因直見斥，終於使得王禹偁忍不住發出不平之鳴，投書時相表示：「未甘便葬江魚腹，敢向台階請罪名」（〈出守黃州上史館相公〉），這是他為自身遭遇的的不平及公理正義的淪沒所發出的控訴與批判。較諸北宋前期其他詩人的貶謫作品，因「直而見斥」使王禹偁詩中時而流露淒惶不平的心緒，如：「君恩已絕望，人事終難度」、「宦途多齟齬，身計頗悲涼」（〈東門送郎吏行寄承旨宋侍郎〉，）、「誥詞黜責子孫羞，欲雪前冤事已休。……道邊極死心終直，澤畔長吟淚暗流」（〈闕下言懷上執政〉）等句，其中甚至隱約流露一種悲觀消極的宿命思想，這與他仕宦生涯的屢遭黜謫以及自

謫官（9首）	〈鄭州與張秉監察聯句〉、〈稠桑坡車覆〉、〈寄獻僕射相公〉、〈御書錢〉、〈北樓感事〉、〈滌上謫居四首〉、〈送都官梁員外同年之江南轉運〉、〈霪雨中偶書所見〉、〈寄杭州西湖昭慶寺華社主省常上人〉
謫宦（13首）	〈聽泉〉、〈弊帷詩〉、〈對雪感懷呈翟使君馮中允同年〉、〈四皓廟〉、〈送舍弟赴舉因寄兩制諸大僚〉、〈上元夜作〉、〈歲暮感懷貽馮同年中允三首〉、〈哭同年羅著作五首〉序、〈滌上謫居四首〉、〈戲題二章述滌州官況寄翰林舊同院〉、〈高閑〉、〈雪中看梅花因書詩酒之興〉、〈朝簪〉
逐臣（2首）	〈睡〉、〈歲暮感懷〉

身強烈的濟民情懷始終不得伸展有關，故王禹偁詩中亦常表露對道之不行的慨歎：「吾道多齟齬」、「吾道遂難行，一旦同得罪」（〈寄獻鄜州行軍司馬宋侍郎〉）「德音苟不嗣，吾道當已而」（〈四皓廟〉）、「命薄任從官進退，道孤難與眾浮沈。」（〈又和曾秘丞見贈〉）等然而由於王禹偁始終堅持「尚志守道」的信念，故亦時而能以之消解宦途潦落的煩惱，如其詩：「知道由自寬，有親強為樂」（〈酬种放徵君〉，2-p654）、「賴有道依據，故得心安妥」（〈七夕〉）等句。然而多次黜謫的經歷，使他無法徹底超然於現實的困厄之上，因此他的詩作內容時而徘徊於自傷與自寬的兩極情緒中。但現實的蹇迫畢竟沒有改變王禹偁最初之志，在第三次被黜後，他寫下：

屈於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謫而何虧，吾當守正直兮佩仁義，期終身以行之。¹⁵

對「道」的恪守不移貫徹為他生命及創作最主要的特徵。他的詩作每以深厚的同情描寫當時人民的苦難境況。如：〈感流亡〉、〈對雪〉、〈揚州池亭即事〉等。《蔡寬夫詩話》形容王禹偁的文學特色與地位：

國初沿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王黃州主盟一時。

他的詩歌觀點與白居易相近，主張詩歌須反映社會現實、具有批判性格，而他平易古樸的詩風，也開啓宋詩平淡化、散文化、議論化的傾向。

王禹偁貶謫經歷與詩作簡表¹⁶

時間	地點	被貶原因	重要詩作舉隅
太宗淳化二年	貶為商州團練副使	時任職大理寺。女僧道安誣訟徐鉉，王禹偁為鉉抗疏辨誣而獲罪。	〈謫居感事〉、〈吾志〉、〈放言〉
太宗至道元年	出知滁州	時任翰林院學士。孝章皇后卒，禹偁主張喪禮當遵舊典，而犯訕謗。	〈北樓感事〉、〈官醞〉、〈聞鶉〉
真宗咸	出知黃州	時任知制誥，預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	〈筵上狂歌送

¹⁵ 同註 14。

¹⁶ 詳見：《全宋詩·王禹偁傳》，同註 12，卷二九三，列傳第五十二，頁 9793-9800。

平元年		(直言趙匡胤篡周而有天下)，得罪朝廷。	侍棋衣襖天使 >、< 歲暮感懷 >、< 瑞蓮歌 >
-----	--	---------------------	---------------------------------

三、寇準 (962-1023)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寇準十九歲進士及第，即深獲太宗賞識，《宋史》形容他「少英邁，通《春秋》三傳」¹⁷，他在〈述懷〉詩中亦自述：「吾家嗣儒業，奕世盛冠裳。……余亦好古者，詩禮承餘芳。」可知寇準亦久習儒術、雅好儒學。寇準年輕時即有傑出的政才，於地方官任上深得民心，他初知巴東、成安二縣，「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¹⁸寇準在政事上雖然表現奮發積極，卻亦有失於剛愎自用，據《宋史》記載，寇準任相位時，「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¹⁹，他的個性使他與同僚相處不善，太宗雖然極為欣賞他的才能，卻也不免為此將他二度外貶。

宋真宗朝時寇準因促成澶淵之盟的簽訂而深獲重用，其後因受王欽若的挑撥，寇準逐漸失去宋真宗的信任，遂於景德三年罷相，到陝西等地任地方官。天禧三年寇準因與丁謂、錢惟演各擁太子、劉后分爲二派，而遭政敵以罪誣陷貶爲道州司馬，其後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卒於任上。

考察寇準的一些貶謫詩作，多爲陝州及道州任內所作，道州地處湘南，近楚大夫屈原之故鄉，因爲地緣聯繫、歷史記憶，使寇準寫下這首懷想屈原之作，詩云：

出門望寒野，四顧惟椒坡。憶昔楚大夫，還此情如何。殘陽半
明雨，水落西風多。因同下蔡恨，不覺增悲歌。(〈晚望有感〉)

寇準詩風沿習五代宋初詩風，即使榮顯得意時詩意亦多清麗哀怨，故

¹⁷ 同註 12，冊十二，卷二八一，列傳第四十。

¹⁸ 「准初知巴東、成安二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嘗手植雙柏於庭，其後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柏。」清 畢沅，《續資治通鑑》(臺北：文光出版社，1975年)，冊一，卷十五，宋紀十五，太宗端拱二年六月，頁 352。

¹⁹ 同註 18。

其詩作很難看出貶謫前後的明顯思想變化。「因同下蔡恨，不覺增悲歌」，顯示寇準當時因遭政敵誣以叛國之罪而遭外放，與屈原無罪被黜的情況是相類似的，因而易於與古人生命興起共鳴。在追念屈原的同時，代入自身之遭遇，因而更添悲傷淒涼之情緒。

寇準貶謫經歷簡表

時間	地點	被貶原因	詩作舉隅
太宗淳化二年	罷知青州	與知院張遜爭事，互斥其短。兩人皆被貶。	
太宗至道二年	罷知滁州	太宗責其「失執政體」。真宗咸平初，改河陽，知同州。	
真宗景德三年	罷為刑部尚書，知陝州	受王欽若挑撥	< 秦中感懷寄江外知己 >、< 初到長安書懷 >、< 南陽夏日 >
真宗天禧三年	降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	坐與周懷政交通，懷政密謀舉事令太子（仁宗）監國，被處死。	< 春陵聞雁 >、< 晚望有感 >
真宗乾興元年	貶雷州司戶參軍		< 臨海驛夏日 > < 海康西館有懷 >

四、宋庠（996-1066）、宋祁（998-1061）

這一段將宋庠、宋祁合而論之，是因為他們兄弟二人的政治命運往往互相依存、同遭升黜，而且兩人的詩觀及文學表現亦有相近之處。

宋庠，字公序；宋祁，字子京，安州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丘。宋庠為官正直敢言，《宋史》記載密州豪王濟私自釀酒，其鄰人往捕之，王濟命令家奴殺其父子四人，結果王濟家奴被判處死刑、王濟卻無罪，宰相陳堯佐維護王濟，在經過宋庠力爭後，才判王濟死罪。宋祁為官論事多能「切中時病」、勇於提出建言，曾上《禦戎論》給君主。²⁰

²⁰ 詳見：《宋史·宋庠傳》，同註 12，冊十二，卷二八四，列傳第四十三，9590-9593。

宋仁宗時，宋庠因與宰相呂夷簡立場不同，被呂夷簡斥為朋黨、出知揚州。皇祐三年，由於宋祁之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遊。張彥方偽造敕牒，為人補官，被處死刑，宋祁因而遭連坐出知壽州，後徙陳州；宋庠亦自行請去，而以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後徙許州，又徙河陽。宋祁後來因與副使程戡不協，程戡被罷，御史彈劾宋庠，宋庠於是又被判知鄭州，後徙相州。

二宋同樣承襲晚唐五代文學，並推崇風騷哀怨的文學傳統，所作詩文亦多偏感物抒懷之作，他們的貶謫詩作亦時常流露牢落頹放的情味，游宦孤臣去國懷鄉之悲愁幽思不絕如縷、如在目前，如：宋庠「歸耕年漸逼，鄉思滿柴車」(〈次韻和州府吳大資病癒後〉)、「久覺宦情薄，何堪星歲徂」以及宋祁「客眼登樓外，鄉愁把酒前」「去國倏三歲，頗知歸思紛」「何里謁歸聊望里，況無車騎得鄉評」等詩句，他們筆下的山水景物時而籠罩一股哀愁的氣氛，如宋庠的〈永陽登樓懷闕下知己〉：

西北樓邊路欲分，神皋不見見浮雲。晉制尺牘波中斷，洛客歸心笛裏聞。麗賦有情傷桂魄，勞歌無卿怨蘭薰。漢家續食催西上，忍逐江鷗狎舊群。

詩中每一句、每一處景物都籠罩上一股幽藐的愁思，而與個體思鄉懷歸的心境緊密糾結在一起。

宋庠貶謫經歷簡表與詩作舉隅

時間	地點	被貶原因	詩作舉隅
皇祐三年	以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後徙許州，又徙河陽，再遷兵部尚書。	偶然人乏貳中樞，賜罷猶專督府居。髮白自傷聞道晚，心丹誰識報恩餘。淮天目極風帆駛，韓野魂銷宰樹疏。卻顧病身何所用，只堪歸釣潁灘魚。	〈自洛移許初至郡齋作〉、〈淮南自訟〉、

《宋史·宋祁傳》，同註 12，冊十二，卷二八四，列傳第四十三，9593-9599。

宋祁貶謫經歷簡表與詩作舉隅

時間	地點	被貶原因	詩作舉隅
仁宗慶曆八年九月	落職，知許州		<有感>、<對白髮自感寄揚州>、<登清思堂寫望>、<秋日西望>、<罷郡將還先寄永興梁丞相>、<謫袁州道中寄蘇子美>
仁宗皇祐三年二月	出知亳州	坐祁子與張彥方遊，出知亳州。	
仁宗皇祐五年正月	徙知成德軍宋祁知宋州。		
仁宗嘉祐四年三月	以三司使宋祁為端明殿學士、知鄭州。		<謫袁州寄子美>

五、范仲淹（989-1052）

1 生平事蹟

范仲淹，字希仁，生於太宗揣拱二年。他年少求學刻苦自勵、孜孜不倦，其學養及人格精神根植於儒家，他在<遺表>中嘗自述：

臣生而遂孤，少乃從學，游心儒術，決知聖道之可行。

「慨然有志於天下」可說是他修身與立朝的思想基礎，據吳曾《能改齋漫錄》記載：

有人謂公（范仲淹）曰：「大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良醫之技，君何願焉？無乃失於卑耶？」公曰：「嗟夫！豈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士大夫之于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

惟相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

21

可知范仲淹年輕時就抱持救人利民、澤及天下的人生觀。入仕以後，范仲淹在政事上「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表現出積極針貶朝政得失及民間利病的態度，他直言立朝、不畏權貴的作法使他在宦途上屢遭貶黜。未任宰輔之前，范仲淹前後三次被貶都是因為直言之緣故。慶曆三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范仲淹提出革新朝政的〈十事疏〉，在其主事下開始推動新政的改革，慶曆四年由於改革失敗及政敵的攻訐，范仲淹遂被貶放放州，其後輾轉徙於鄧州、杭州各州。

2 詩歌內容

范仲淹貶謫時期的作品不見屈賈傳統的哀怨情調，反倒充滿歡樂疏放的筆觸，像是：「人生安樂處，誰復問千鍾。」「我無一事逮古人，謫官卻得神仙境。自可優優樂名教，曾不恹恹弔形影。」這與他的出處態度有關，他曾自述對進退用捨的看法：

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

省視他的作品內容，可知范仲淹誠然由內而外地實踐此一儒家樂道自處的思想，而不將個人的窮通順逆縈繞胸中，其詩作還表現出雅好山水的濃厚興趣。范仲淹在慶曆新政失敗貶知鄧州時，受滕宗諒之邀寫下了著名的《岳陽樓記》，其中完整陳述他所持的貶謫心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將憂、樂情緒擺脫一己得失榮辱的束縛，而與整個天下的興衰治亂聯繫起來，其「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操亦為宋代士人開創出一種新的人格典範與處逆模式。

范仲淹貶謫經歷簡表

時間	地點	被貶原因	詩作舉隅
仁宗天聖七年	出為河中府通判	時任秘閣校理。上疏請皇太后還政，疏上，不報，遂自	

²¹ 吳曾，《能改齋漫錄》（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頁251。

		請外放。	
仁宗明道二年	出知睦州。不半載，徙蘇州。	時任右司諫（言官）。與權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德等人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	< 鄱陽酬泉州曹使君見寄 >
仁宗景祐三年	知饒州。不半載，徙蘇州	上《百官圖》，指摘宰相呂夷簡用人惟私。	< 謫守睦州作 >、 < 出守桐廬道中十絕 >、 < 蕭灑桐廬郡十絕 >
仁宗慶曆五年	知鄧州，其後歷徙杭州、青州、穎州。	慶曆改革失敗，改革派人士相繼被貶黜。	

六、歐陽脩（1007-1072）

1 生平事蹟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廬陵人。歐陽脩以經時濟民為政理想，重視將復興儒道與政治改革相結合。《宋史》描述他：

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幹請，輒諭可否。雖台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眾。²²

可見歐陽脩秉性之剛直，他的一生兩次被貶也都與此有關。第一次於景祐元年，歐陽脩甫初入朝任館閣校勘，其時范仲淹因上《百官圖》被貶，余靖、尹洙等人紛紛上疏論救，歐陽脩寫〈與高司諫書〉，責備司諫高若訥不應主張仲淹當貶，因此被貶為夷陵縣令。第二次則在慶曆五年，當時慶曆改革失敗，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等相繼被罷官、外放，歐陽脩亦「自劾乞罷」以「同其退」，並上〈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結果被貶知滁州。

2 詩歌內容

²² 詳見：《宋史·歐陽脩傳》，同註 12，冊冊十三，卷三一九，列傳第七十八，頁 10375-10384。

歐陽脩的兩次被貶皆為他理性選擇的結果，所以他的貶謫心態並不窮愁苦悶，其詩文亦多呈現理性自持、以道自處的磊落胸懷。他在〈與尹師魯書〉中即云：「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²³以為士人不應以貶謫為苦、而「作戚戚之文」。因此歐陽脩每能冷靜理性地從窮窘的謫居生涯中發掘正面價值，如：詩中嘗言：「行見江山且吟詠，不因遷謫豈能來。」及後來在〈與焦殿丞書〉裏所說的：「某再為縣令，然遂得周達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為益。」²⁴使他的詩風益發呈現理性化思考的傾向。

初期在困蹇的處境中，歐陽脩雖亦偶有挫折、頹喪之感，但仍能以其理性、豁達的心性超然其上，表現出坦然閒適、自足自樂的情懷。到歐陽脩第二次貶知滁州時，其貶謫心態更進一步煥發為衷心喜樂：

某此愈久愈樂，不獨為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小邦為政，期年粗有小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²⁵

這時歐陽脩的作品已表現出貶謫生活與山水相親的閒適自足，徹底地融入貶所生活，呈現純然豁達開朗、無所窒礙的心境。

歐陽脩貶謫經歷簡表

被貶時間	被貶地點	被貶原因	詩作舉隅
仁宗景祐三年	貶夷陵令	寫〈與高司諫書〉，責備司諫高若訥不應主張仲淹當貶	〈和丁寶臣遊甘泉寺〉、〈送京西提點刑獄張駕部〉、〈斑斑林間鳩寄內〉
仁宗慶曆五年	知滁州	慶曆新政失敗	〈送章生東歸〉、〈啼鳥〉

七、蘇舜欽（1008-1049）

²³ 〈與尹師魯書〉，收入：《歐陽脩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6月第1版），頁491。

²⁴ 〈與焦殿丞書〉，同註23。

²⁵ 〈醉翁亭記〉，同註23，頁276。

1 生平事蹟

蘇舜欽，字子美，祖籍梓州銅山，曾祖時移居開封。他出身仕宦之家，其父蘇易簡曾在太宗、真宗朝出仕，且官至參知政事，家庭背景使得蘇舜欽自幼便深受文化知識薰染。《宋史》記載蘇舜欽「少慷慨有大志」，且「好爲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遊」²⁶，他的爲人與詩文都流露一股豪邁慷慨的氣息，如〈吾懷〉一詩：

吾聞壯士懷，恥與歲時沒。出必鑿凶門，死必填塞窟。風生王張上，令下厚地裂。百萬呼吸間，勝勢一言決。馬躍踐胡腸，士渴飲胡血。旌臙屏除盡，定不存種孽。予生雖儒家，氣欲舌逆羯。斯時不見用，感難腸胃熱。晝臥書冊中，夢過玉關北。

詩中表現的雄健豪渾之氣略近唐人，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評他「子美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可說十分切近蘇舜欽的文學特色。蘇舜欽受儒家思想影響，胸懷建功立業、愛國爲民的政治理想，他曾在〈舟中感懷寄館中諸君〉裡寫下：

不然棄碩席，挺身赴邊疆。喋血塵羌戎，胸膽森開張。彎弓射把槍，躍馬掃大荒。功勳入丹青，名跡萬世香。是亦丈夫事，不為鼠子量。

從「挺身赴邊疆」可知蘇舜欽有著捨身報國、爲國爲民的雄心壯志。入仕以後，蘇舜欽往往直陳時弊、慷慨直言，「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宋史》記載蘇舜欽甫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縣尉，當時玉清昭應宮發生災變，年輕職微的蘇舜欽立即上疏，疏中洋洋灑灑數千字，先指出災變之降乃是由於朝廷「任用失人、政令多過」之故，接著勸諫君主應「責躬罪己」，「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²⁷，表現他爲求補正時弊，略無隱諱、不畏禍及的政治精神。

在政治立場上，蘇舜欽傾向接近范仲淹爲首的改革派。蘇舜欽時受范仲淹舉薦、召爲集賢校理、監進奏院。並娶同與仲淹在政府之宰相杜衍女爲妻。保守派官員王拱辰等人爲打擊范仲淹等人的勢力，遂以細故構陷蘇舜欽入罪，此即爲慶曆年間喧騰一時的進奏院案，此案牽連改革派官員十一人皆被罪受罰，蘇舜欽則因此被削籍爲民，他

²⁶ 詳見：《宋史·文苑四》，同註 12，冊 16，卷四四二，列傳第二百零一。

²⁷ 同註 27。

在被除籍後，「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²⁸，後來蘇舜欽終於被復用為湖州長史，但未到任及病逝。

2 文學表現

作為一個關切時政、渴望有所作為的詩人，蘇舜欽的詩常常觸及一些嚴峻的現實問題。他的〈慶州敗〉記敘宋王朝與西夏戰爭的失敗，痛心疾首地批評朝廷在邊防措施上的鬆懈和將領的無能；〈吳越大旱〉寫到一方面饑荒病癘使「死者道路積」，另一方面官府為了應付與西夏的戰爭，仍無情搜括糧食，驅使丁壯勞力上戰場，致使「三丁二丁死，存者亦乏食」的慘況。

貶謫生涯對蘇舜欽的創作影響很大，使他一改前期雄健的詩風而轉為激憤，他在被貶謫前所作文體多為政論文，但被貶謫後則多作些抒懷的詩歌。

八、韓琦（1008-1075）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他從政慷慨直言、急切為國，《宋史》記載：「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甚至君主亦認為「韓琦性直」。²⁹慶曆年間，韓琦與范仲淹、富弼皆在朝，共同主持慶曆新政，因為政敵所謗，毀譽日盛。新政失敗後，韓琦便自請外放，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

韓琦的文學作品向能突破傳統，表現不同的情味，像他寫有〈落葉〉一詩：

人觀落葉悲，我視落葉喜。請看四序速，次第若屈指。風霜一瞬過，望春時有幾。榮固悴之端，衰亦盛之始。須知眾木疏，

²⁸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同註 24，頁 221。

²⁹ 同註 12，冊十六，卷四三九，列傳第一百九十八，《文苑一》。

便是群芳啟。舉此較人事，蓋不異物理。否泰與溟長，反復殊未已。釀酒整笙歌，坐待新萌起。

便能突破固有的書寫心向及模式，從葉落過程發現事理趣味而自得其樂，他以循環的時間觀看待葉的生落，擺脫以往的線性時間觀點，則葉或生或落都只是暫時的變化，他更進一步將此觀點對應到人事，認為人事之榮衰不過也是反復循環的表相而已，此思考路徑呈現一種理性的思維，呈現宋詩主理的特色。

韓琦理性樂觀的情性使他能不視貶黜為畏途，《古今詩話》記載神宗時韓琦堅辭相位出知陳州一事：

魏公自中書出守相州於居第作狎鷗亭，永叔寄詩曰：「豈止忘機鷗鳥信，鈞陶萬物本無心。」魏公喜曰：「余在中書，進退升黜，未嘗置心於其間，永叔可謂知我。」³⁰

可知韓琦向不以「進退升黜」為意，故雖外放之時亦多作歡樂之語，如：「塞寒春尚淺，谷樂政同優」、「笑問此身何計是，不如喜節倒垂蓮」等。

³⁰ 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9月臺二版），上冊，卷一，頁330。

第二節 北宋前期貶謫詩出處主題綜論

從上一節個別詩人的作品分析中，可以發現北宋前期的貶謫詩作雖在不同詩人筆下呈現出不同的思想內容，但貶謫文學的思想內容、情感表現亦隱然在北宋時期逐漸產生新變與轉化，發展出另一種不同於前代貶謫文學慣見書寫模式的時代特色。

一、現實理想的平衡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觀點，是北宋以前士大夫普遍的出處心態，仕是中國士大夫的生命基調，隱則是士大夫在仕途遭遇挫折時的處逆模式與自保之道，如同《莊子·繕性》所描寫的：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身而弗見也，非閉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於天下，則反一無跡，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然而北宋時期清明的政治秩序及寬待士人的種種政策，則使得北宋士人在面對貶謫情境時，大多皆能泰然處之、靜待可以再回到政治舞臺上發揮所長的一天，外顯的仍是以出為生命主要價值的看法，則處只變為大多數貶謫作家偶然興起的牢騷而已。然而伴隨貶謫而來的身心磨難仍舊不斷試探、動搖著士大夫的意志：

現實處境是殘酷的，往往並不肯定人的價值意願，當作為個體的人在感到自己無力去獲取某種價值時，很容易走向否定和詆毀價值本身。³¹

北宋士大夫如何在外部現實與內部價值的衝突間，尋求一套調和及平衡的生命模式，則是在研究北宋時期的貶謫詩時值得深入探討的重點所在。根據筆者的觀察，北宋士大夫雖有貶謫的困苦、失意的牢騷，但仍能對世界抱持一種樂觀嚮往的態度，可能一是從認知上進行理性思考，在心理化逆境為順境；一是從行為上藉著其他活動轉移現實之苦悶。

（一）理性思考

³¹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臺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0年）。

1 以道排遣

《說文》「士」字云：「士，事也。」段《注》曰：「凡能事其事者稱士。」《白虎通》則云：「士，事也。任事之職也。」可知士的本職即為出仕任事。士之為仕有「仕以謀生」、「仕以求道」二個層面的心理取向，前者屬功利層面，為求自營生計，光宗耀祖；後者則屬志業層面，期能弘揚道義、拔濟生民。陳耆卿在《嘉定赤城志》³²裡亦云：「(士農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可知在宋人的觀念裡，「士」亦為一種職業的代表，而對除讀書外無一技之長的讀書人而言，仕進則是他們最理想的營生途徑。可知對以出仕為己職的士大夫而言，除去政治環境的因素，士在面臨仕隱、出處的選擇時，「道」與「祿」總在其心中發揮著作用，此消彼長的存在著，即便像陶淵明那樣以歸隱為志業的隱士，仍不免有曾為「五斗米」而出仕的窘迫景況。

隨著北宋儒學的逐漸復興，北宋士大夫逐漸回歸為儒家的基本性格，「道」成為士階層統一的生命核心價值，得位行道成為實現此價值的最高理想，在宋代士大夫的心中，求仕的志業目的性，遠遠超過功利目的性，柳開首倡古道，便將「道」標舉到最高的位置：

縱吾窮餓而死，死即死矣，吾之道豈能窮餓而死之哉！

道既超越一己生死，自然也超越個人的權位利祿。晁迥在〈傲歸去來辭〉定位「道」與「位」的本質為：

求位不由己，求道不由天。位即無以求，道可使進焉。且務由己者，己能盡心源。勿問由天者，天高擅化權。

其認為求道由己、求位由天，認為士君子因致力於道、而非位的追求，是將道德價值的追求看作人生最高的價值，並肯定人的個體主體的獨立性和主動性。與孟子的「性」、「命」說³³有相通之處，成為王禹偁則在〈東觀集序〉中談及道、位、文三者的關係：「士君子者，道也；行道者，位也。道與位並，則敷而為業……」北宋前期的士大夫普遍

³² 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七。

³³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于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孟子·盡心下》）

有著道超越權位此一認知，呂陶在〈送周茂叔殿丞〉的詩序亦言：

君子能信道，不能信于人；能自知，不能必知于人。得乎中不奪于外，環視天下而輕重己，死生貴賤、否泰休戚未嘗少遷其思索，以戾其趨向，故能也。³⁴

由於道的價值超越現實的權位，道是主體的內在價值，亦為根本價值，是「得乎中不奪于外」的，因此貶謫詩作中常可見到詩人以「道」的信念來排遣「位」的喪失，如王禹偁的〈放言〉寫道：

人生唯問道如何，得喪升沈總是虛。寧可飛鳥隨四皓，未能魚腹葬三閭。傅巖偶夢誰調鼎，彭澤高歌自荷鋤。不向世間爭窟穴，蝸牛到處是吾廬。

道是終極不變的核心價值，從道的觀點來看待位，位不過是藉以行道的工具。作為根本價值的道如喪失，生命秩序便崩潰，得喪升沈不過是外在的虛相而已，無論進退得失，士君子皆要固守「道」，只要守道，外在的榮辱得失便不會加損於身，士大夫亦時常以此共勉：

惜君有高才，舒卷莫非道。進取雖繫時，退藏亦在道。

大抵君子心，惟義攔藏韞。進非為私謀，退亦為道隱。顧彼榮與辱，於吾不加損。

「名位」不再是他們所汲汲營營追求的，「未大用間，亦處處有仁義可行。」這些無位也能行道，卑位也可作為的事實堅定了「道」的信念。既然無「位」而於「道」無虧，那麼權位利祿的損失變成了無謂。甚至在宋人看來，因「道」的堅持而蒙受「位」的損失，正是值得敬偷的宦。唐介被擢英州別駕，李師中作詩稱其「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歐陽修亦以為「以言被黜，便是忠臣。」

2 反向思考

反向思考是從另一面來解釋、思考，變苦為樂、化不利為利，此亦是一種理性思維的展現，如前述韓琦觀落葉而覺喜，歐陽脩在看待罪責時，亦以反向思考化解其所帶來的磨難，他在〈夷陵縣至喜堂記

³⁴ 〈送周茂叔殿丞〉，收入：《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冊十二，卷六六一，頁7743。

> 裡寫道：

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為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夫罪戾之人，直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³⁵

開放心胸體會貶謫生活中的可樂之處，則貶謫不再是苦難的代表，反而可能帶來意外的驚喜。不僅歐陽脩如此，北宋前期的貶謫詩人在描繪所貶處所的山水景色，大部分皆能抱著樂觀的角度欣賞，而不像唐詩時將貶所視為窮山惡水之投影，寫景或悽慘怖厲、或沈鬱無生機，即使是人人聞之色變的嶺南，在北宋詩人筆下也往往有著動人之處。像盧多遜的〈南水村〉及丁謂的〈山居〉：

珠崖風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門。鸚鵡巢時椰結子，鷓鴣啼處竹生孫。漁鹽家給無虛市，禾黍年登有酒尊。遠客杖藜來往熟，卻疑身世在桃源。

峒口清香徹海濱，四時芬馥四時春。山多綠桂伴同氣，谷有幽蘭讓後塵。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爭如彼美欽天壤，長薦芳香奉百神。

在他們的筆下嶺南的風土也變得溫暖可親，甚至讓詩人有著置身桃花源之錯覺。

（二）其他活動

貶謫詩人由於地處偏僻、事務清簡，除了公事之外，他們有更多的閒暇時間，逐漸退向自己內在的世界，尋找可以安頓自己身心的活動，解消生存的困境。北宋詩人多兼政治主體、學術主體、文學主體於一身，因此當政治上受挫時，詩人最常轉而經營學術、教育或文學等文化或藝文活動。發憤著述、文史自娛向為中國文人悠久的傳統，但像王禹偁將它上升到道的自覺，統一到對人生的積極追求中去則不

³⁵ 同註 24，頁 270。

多見³⁶。王禹偁以作詩自娛，並在詩創作實現道的理念，他在〈前賦春居……〉詩中說到：

命屈由來道日新，詩家權柄敵陶鈞。任無功業調金鼎，且有篇章到古人。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從今莫厭閑官職，主管風騷勝要津。

另外貶謫詩人亦常透過遊歷活動消解憂悶，山水勝景、花木鳥魚都成為他們樂以消憂的媒介。還有北宋時期三教思想的漸趨融合，則使貶謫詩人可以透過佛道思想來求得心靈的解脫，如寇準〈南陽夏日〉詩中描述的：

綠楊陰密覆回廊，深院簾垂晝景長。人靜獨聞幽鳥語，風來時有異花香。世間寵辱皆嘗遍，身外聲名豈足量。閑讀南華真味理，片心惟只許蒙莊。

還有夏竦的〈偶成〉一詩：

非才偏歷清華地，悟佛方為止足身。浮名浮利莫相試，三千世界一微塵。

保庇孤根逢聖主，矜修晚節順天機。空門自有清涼地，不向紅塵議是非。

燕雀紛紛出亂麻，漢江西畔使君家。空堂自恨無金彈，任爾啾呼到日斜。

佛道思想提供另一個可能的思考路徑，因此在面對苦難時，貶謫詩人往往能不深陷於其中，可以借由佛道自由而逍遙的生命，從苦難中得到超脫的力量。

二、出處意念的呈現

（一）以出為主的態度

北宋前期的貶謫詩人雖然受罪獲貶，但仍多表現積極的參政意

³⁶ 程杰，《北宋詩文革新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2月），頁63。

識，在自身的岡位上繼續發揮所長、關心民瘼時政，如寇準的〈成安感秋〉所說的：「達則濟天下，窮當守一丘。胡能效時輩，覩冒隨沈浮。」雖不能施澤於天下之人，也要惠及於一丘之民。類似的觀點處處可見，如：田錫：「館殿嘗爲侍從臣，出分憂寄牧黎民。」余靖：「政成先養正，惠愛及民深」，即連被削籍爲民的蘇舜欽也有再起的願望：

人生貴壯健，及時取榮尊。此身自流浪，豈能濟元元！天下無所歸，泛舟旅江村。閑困尚有待，不忍沈湘沅。

「閑困尚有待，不忍沈湘沅。」呈現詩人雖久遭棄廢，仍存報國濟時之志，希望有一天能夠再起而效時。北宋貶謫詩人絕大多數都抱著這樣積極的參政心態，他們的出處態度基本上是持儒家觀點的，而歸田返鄉之思往往只是他們暫時的牢騷之語，一有重獲重用的機會他們仍然會積極出仕。由於貶謫詩人心中抱持著以出爲主的價值信念，其詩作亦往往流露出關心時政、體現民瘼的內容，詩人往往在詩歌中寫下對人民痛苦的所見所聞，例如：前引田錫的〈思歸引〉或王禹偁的〈感流亡〉等作品。

（二）憂樂主題的深化

由於「道」漸爲北宋前期士大夫所關注，在貶謫詩中圍繞著道爲中心，「憂道」、「樂道」的二種取向持續不斷的發展及深化。憂道、樂道是儒學的傳統主題，是以道爲中心的思考模式，憂道是憂道之未行，樂道是樂道之既得，兩者實爲一體之兩面，體現儒家傳統對道德價值理念的重視。

以道爲影響個體憂樂與否的依據，是當時貶謫詩人普遍用以自我勉勵、自我消解貶謫苦悶的手段，如：「養志安貧道可尊」「豈期顏子淵，不朽在一瓢。推此任窮達，其樂方陶陶。」「得忘羈旅憂，蓋以道義俱。」「滁州太守文章公，謫官來此稱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豈有遷客容。」憂道則相當於一種憂患意識，孔子講「士志於道」，士作爲道德價值理念的維護者，肩負起拯救社會無序的宏願，激發起無限憂道憂民的悲情。「君子憂道不憂貧」，這種憂道的積極入世品格，使憂世憫民精神得以提升，而與仁相融合。儒家講求推己及人，憂道、樂道都講求將道德價值從個體推廣到群體，這是屬於道德價值層次的

道德思維。當關注的焦點在自身時，所憂為德業未成，所樂為持道自守。當憂道、樂道的信念推廣到群體，則有一種積極入世的社會價值承擔意識，如石延年的〈送窮〉：

世人貪利意非均，交送窮愁與底人。窮鬼無歸於我去，我心憂道不憂貧。

其義同於范仲淹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是以道德價值的層次來思考憂道、樂道的主題，屬於道德思維下的憂樂主題。隨著理學思潮的萌發，另一種審美觀念層次的，亦即理性思維下的憂樂主題，亦開始在北宋前期醞釀，其代表為宋初理學家邵雍的「以物觀物」說，「以物觀物」意謂將自己抽離物之主體，而作客觀的審視，客觀、美感，以審美的情意消解，關展出另一條樂道的路徑來。「與民同憂樂」的樂道之路是承擔著政治責任的，「以物觀物」之樂則是純然的內向自足，因為道內在的充足，故能不以外在順逆繫於心，能發掘山水之物真正的情味來。即邵雍所說的：

近世詩，窮戚則職於怨恚，榮達則專於淫佚。身之休戚，發於喜怒；時之否泰，出於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故其詩大率溺於情好也。予自壯歲業於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於前曾未入於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為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日吟詠情性，曾何累於性情哉？

他認為「道為天地之本」，而「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¹，而「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觀物即「觀之以心」、「觀之以理」。「以物觀物」是宋人理性發揚的表現。用理性去觀照一切，駕馭喜怒哀樂的情緒波動，在哀樂的情緒表露背後，每可見到理性的運作與反思，這不僅沖淡哀的情緒，也使樂的表現呈現了一分哲理化了的放達意味。則自身的遭遇也成了可觀之物，上昇到宇宙真理的層次，得以用第三人客觀的角度去省思、審視自己的生命

歷程及價值，沖淡了那種我在其中的強烈情感。歐陽脩的詩中偶也流露出這種理性的觀感，如〈答和王宣徽〉一詩：

相逢莫怪我皤然，出處參差四紀間。有道方令萬物遂，無能擬乞一身閑。花前獨酌尊前月，淮上扁舟枕上山。此樂想公應未暇，且持金盞醉紅顏。

他的〈豐樂亭記〉、〈醉翁亭記〉更進一步將樂道精神擴而從個體之樂推及到群體之樂，重視與民同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是樂道主題的進一步深化，其中有人類群體與宇宙混一而同的天人合一般的快足感。

無論是道德層次或是審美層次的樂道精神，其終極價值都是一樣的，欲達到主體情態的快樂。亦即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中所說的：

個體的自足心態的盈盈快樂，心理意向的最高狀態都超越了外部事物的限制，轉向主題的情態本身。道德倫理也好，自然宇宙也好，都不過是獲求快樂的中介，主題情態的快樂才是最終的目的，因而，這快樂情態最終超越了道德倫理和自然宇宙，成為終極的真實。³⁷

儒家的孔、顏樂道處窮之樂源於心存仁義之道，從價值觀點出發，是以能自得其樂，不為物欲所累，追求一種心對物的超脫。宋代理學家從理的角度出發，使心中仁義之道與萬物之理融會一體，其目的雖在涵養仁義道德，但卻與藝術創作的審美態度有相通之處。

小結

北宋前期的貶謫詩作不同於前代貶謫文學，而開展出屬於自身時代思想特色的作品，其特色可以歸納為二個方面來說，首先是呈現積極入世的精神，表現以出為主的心態，貶謫詩人仍究伺時而動、等待以才效時之機會；其次則為情感表現及審美取向，由於理性思維的漸次滲透，以及文學家在創作時有意識地突破前代人創作模式，因此北宋前期的貶謫詩作，帶著悲哀頹喪意味的作品，漸漸為理性自適的風格所取代，是屈騷傳統激昂外放情感之突破。

³⁷ 同註 31，頁 210-211。